

大众日报
客户端大众日报
微信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

□ 王学典

变的方式延续着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说,在数千年彼此相对隔绝、发展演变缓慢的传统社会中,尽管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未断绝,但从总体上看人类文明的双重属性特别是时间属性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人类文明的这两个属性本质上都是比较的结果。从时间属性看,在大航海时代以前,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前,不同文明之间在发展程度上只有量的差异,尚未形成足以实现降维打击的实力差距,反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蛮族在军事上往往对先进文明造成征服和屠戮,这在东西方文明史上都曾上演多次。不过,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权的消亡尽管在短期内会对文明造成冲击,但在长期看却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有时反而会由于汲取新鲜元素而获得创新性发展,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尤其明显。

历史上,中华大地虽曾屡遭异族涌入、兵火战乱,华夏政权在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数易其手,但无论是哪一族哪一家哪一姓入主中原,最终都会继承兼收并蓄,向心凝聚的中原文明基因,秉持“王者无外”“四海一家”的天下观念,认为华夏和其他族群之间没有绝对的血缘和种族界限,只有价值和他者上的差异,所以以往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多民族文化以及异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华文明一直以来是靠靠实力或者是文化上的魅力或者是开化程度凝聚在一起的,越是大度包容,就越能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与久远的历史意识,赋予中华文明以自我发展、回应变局、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使之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华文明的这种包容性连续性特质,与建立在传统社会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基础之上的文明观密不可分,对于文明的时间属性总体上是忽略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是农耕文明的典型特点。不仅农耕文明如此,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前的海洋文明、游牧文明,从林文明、山地文明等等,这些不同文明之间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都不足以构成对其他文明的颠覆性冲击,或者说在时代维度上并无质的差别。

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逐步迈向由西方现代文明引领世界秩序的工业时代,在时间属性上位居更高层次的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在政治、军事领域,都呈现出全方位碾压性优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而使数千年形成的文明权力格局和边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在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下,那些非西方文明的族群开始清醒认识到文明时代属性的重要意义。

以中国为例,100多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是

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关键节点。在国家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一批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发现和强调了文明的时间属性或者说时代属性,于是他们得出了一系列结论:西方文明是先进的,中华文明是落后的;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是中世纪文明;西方文明在思想文化上以作为新文化或新学的西学为根基,中华文明在思想文化上以作为旧文化或旧学的中学为根基;西方文明属于工业文明,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所以,在时人看来,中华文明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必须摒弃中华文明,全盘引进西方文明,并用西方文明来全面替代中华文明。这样,由于发现了文明的时间属性,这时主流思想界就把东西问题归结为古今问题,把空间问题还原为时间问题,也就是把东西方之别归结为古今之异,结论就是非西方文明必然走向衰微和灭亡。

文明空间属性的发现与文明多样性问题的提出

正当西方文明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下一路高歌的时候,其所孕育的深刻内在矛盾也在不断积累,从周期性经济危机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发达的西方文明反而给人类造成了更大灾难,迫使人们开始全面反思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根源在哪里。尽管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又进入一个高度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人们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发现和重视其他文明价值的努力从此开始。随着世界重视体系的瓦解与新兴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演化出众多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代表了人类为克服生存困境而选择的智慧方向,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都有不可替代意义。

受此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自觉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批传统文化学者提出了文明的双重属性问题,即文明不但有时间属性,或者说时代属性,更有空间属性,或者说民族属性。与时间属性一样,空间属性或民族属性也是固有的,不可磨灭。文明二重属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文明绝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超时间,超空间的文明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各有其古代与现代的不同时间属性;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也各有东方与西方的不同空间属性,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都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文明空间属性的发现,就这样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传承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文明的空间属性在21世纪的中国还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昭示。当代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完美传承了中华文明贵

任为先,集体至上与和合共生的东方伦理型文明特色,开拓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国实践再次证明,不同空间属性的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为整个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种路径选项。

对话是多样文明共荣共生的最佳途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6000年来的人类历史中共有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文明比较成熟。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化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

实际上,今天的考古学已经证明,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曾存在过无数的文明。大浪淘沙,那些文明特别是体量较小的文明或因自然灾难,或因人口激增,或因冲突战乱,绝大部分已经灭绝,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最后剩下活下来的只有几个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文明体,而这些大型的文明体相互制衡,谁也无法取代谁,谁也不能消亡谁,谁也难以同化谁,这就是今天的现状。彼此和谐相处,交流互鉴,才能使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获得永续发展,而且,在这些不同文明体之间展开对话,实现互鉴,可能还是这些文明形态之间交往沟通成本最低的方式。

文明对话会有许多层面和方式,而学术对话则是更具理论先导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方式。学术对话的出发点应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而积极与西方主流文明的对话,当然是各大型文明彰显自身之美的最佳途径。这是因为,尽管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困境,但凭借其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积累的强大优势,西方现代文明仍然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各大非西方文明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勇于善于开展与西方文明的学术对话,可以促使自身逼近乃至进入主流,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崭露头角,并汲取西方现代文明的有益元素而与之互学互鉴、融通发展,从而拥有长远未来。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力量。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期待不同文明在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的对话中展示自身勃勃生机,同时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上阔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以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理论实践渊源。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使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的同时,还关心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资本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要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正处在一个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的时代,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遇阻,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和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启迪。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领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可以重塑现代化世界版图,将激发更多发展中国家勇敢探索发展和繁荣的本国方案,极大提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信心。

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有力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的进程。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南北鸿沟不断扩大,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共同富裕理念和路径将与其他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将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助力。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球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文明观,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智慧精华,为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明基础。

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是竭泽而渔、破坏环境资源的现代化,既致力于增进当代人福祉,努力保障子孙后代权益,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将加速全球绿色转型,为各国实现绿色发展提供借鉴,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加确定性和稳定性。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球共同价值,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今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新起点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汇聚力量。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国际共同安全。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中国始终致力于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提供建设性方案,为促进国际共同安全、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世界互利共赢。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果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中国将积极举办进博会、消博会等国际经贸展会,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将为国际社会创造广阔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加快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债务负担,积极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公共产品。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将继续为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提供新理念新平台新倡议,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发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平台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启迪。中国将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对话和交流,共同探索全球性挑战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将继续推动同其他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不同领域的交流。

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美丽地球家园。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持续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在国内层面,中国将继续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完善全国碳市场等措施,实行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国际层面,中国将继续大力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气候多边进程,推进国际社会加快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以自身稳定为世界和平提供不竭动力,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贡献美好蓝图。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张玉环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冲突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全球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今天,造成人类社会种种风险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不同文明之间无法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有关。不理解其他文明,就会固步自封,自设藩篱,拒绝交流,从而导致文明间的隔阂,不尊重其他文明,就会以自己的文明优越感否定其他文明,甚至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将文明隔阂升级为意识形态对抗;不信任其他文明,就会对其他文明心怀戒惧,以零和思维方式看待其他文明的发展壮大,以致排斥打压其他文明。所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最关键的就是解决好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这一根本问题。

而解决好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承认一个前提,这就是,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一个清一色的自然界是令人恐惧的,无论这个颜色是红的、白的、蓝的还是绿的,同样,一个清一色的人类社会也会让人恐惧。中国有句古语:十里不同俗,百里改规矩。世界上的人们一直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不同地域族群的有限活动范围造就了彼此间的差异,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造就了各地族群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秩序架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文明多样性由此形成。

承认并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实现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才能真正消弭国际冲突根源,走出结伴共赢的新路。因此,我想从文明的两个基本属性出发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

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提出了文明的时间属性问题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同时具备时间和空间两种属性。文明多样性就是在文明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的双重维度观照下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所谓人类文明的时间属性指的是文明的发展程度问题或阶段问题,空间属性指的是各个文明的时代特征或特色问题,这两点全部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几千年来,由于受到地理隔绝的限制,几乎每一种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由于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发展进程缓慢,人类观察到的世界日复一日地复制过往,几乎每一种文明都以一种亘古不

谁在农村种地?怎样种好地?

□ 杨志恒

种地是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与关键所在。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解决农民“种地难”问题,创造和提供有利于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谁在农村种地?怎样种好地?”这一重大问题,笔者赴鲁北平原、胶莱平原等农业主产区开展调研,带来第一手观察与思考。

“种地人”群像

时至今日,农村的“种地人”构成不断变化,来源更加多元化。我们调查发现,目前在乡村种地的农户占农村常住人口约70%左右。实际种地的农户主要包括四类人:单个家庭经营的自耕农、兼业农户,规模经营户和新农人,占比分别为45.1%、26%、1.4%和10.5%。

首先,自耕农是种地时最常见的身影,但老龄化趋势明显,“自耕农经济”不断解体。小农户自耕自种是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缩影,一家几、几亩地,自给自足,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且农业生产效益相对较低,大量农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调查发现,留在村里的自耕农普遍年龄在55岁以上,学历不高,接受农业新技术的能力较差,存在知识结构的偏差,耕种的土地多为自家承包地,规模小于2亩,收益低,以自给自足为主,随着年事增高,丧失劳动力后会选择把土地租出去或者流转出去,不再种地。

其次,兼业农户占比较大,农民兼业化和农业副业化的状况已经成为普遍情况。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周期性,闲时务工,忙时务农,是很多农民的生活常态。当下,农业机械化普及极大提高了农业作业效率,集中播种和收获的用时短,种地变得简单,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这类人拥有城市和农村双重身份,就业广泛,家庭收入不依赖种地收益,但部分农户缺乏耕种技术,选择将生产关键环节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个人,但由于外出就业的不稳定,农户为最大化自身利益会将土地视为最后的生活保障,不愿意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规模经营农户不断壮大,农业生产经营向产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规模经营农户主要包括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农户闲散土地集中承包,进行规模化、机械化连片种植,实现了农地高效利用,还节约了人力成本。我们调研发现,虽然规模经营农户人数较少,平均每个村5户左右,但他们有技术,懂经营,产出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可达100%,而且他们有些同时还是社会化服务主体,拥有丰富的耕种、农资经销、农机服务或农产品加工等经验,为耕、种、防、收、储、运、销全产业链协同打下基础,但存在经营不善等情况,毁约退地率高。

第四,下乡、返乡新农人活跃在生产一线,集聚起一批工厂化、标准化、订单型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山东省工商资本下乡规模超千亿元,一批具备复合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先锋,给农村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的重要体现。我们调查发现,这类人群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多采用精细化、智能化农业作业方式,规模化经营程度高,经营场所相对固定集中,核心技术领先,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主体,对土地承包、流转有较为清晰的合同约定,对于农产品市场走向把握较为准确,在他们带动下,有效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

种地面临的制约

现代农业打破了以精耕细作、小面积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内循环模式,对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地”“钱”等要素配置提出更高要求,叠加农业面临的诸多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要想种好地,如今还面临一系列制约:

第一,“缺人”,农民断代与农业人才缺口问题突出,中小农户在现代农业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到来,使得农村常住人口大量减少,农民断代现象明显,农业劳动力缺口不断被机械化替代。同时,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渗透,农业生产分工不断深化,农业已不再是简单劳动密集产业,农业新品种、新农机、新技术、新商机层出不穷,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开始有了技能门槛限制,而现有高龄、兼业小农户的知识、技能、观念等已经不适应这种变化,对农业新技术应用缺乏热情,往往游离于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之外。

第二,“缺地”,农地分散化经营与设施农

用地保障不足严重制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一方面,现有农地经营规模过小,权属细碎化制约了土地流转,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导致耕作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成本高,缺乏市场竞争力,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工厂化的现代农业对设施农业用地需求大,农地供给与现代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衔接不足,缺少针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专题规划,设施农业用地保障困难已经成为普遍性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提高。

第三,“缺钱”,农业较低收益率和较高的经营风险导致农业融资困难。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然而农业投资回报率低,流转速度慢,变现困难,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且农业项目门槛太高,容易复制,“乱跟风”“一窝蜂”造成农产品同质化严重,侵蚀投资利润。此外,受涉农投资资产确权难,农民征信记录少等影响,种地频频遇到抵押难、抵押物不足等融资难题,融资多依赖自有资金,难以做大做强。

第四,“缺配套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不足,建设标准低,农业生产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尽管现代科技提高了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但现代农业依然无法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其中,水资源是制约农业生产的最大障碍,受水利设施陈旧、水域面积急剧萎缩等影响,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已面临“靠天吃饭”。同时,现代农业科学种植和耕作方式对农业配套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对种质资源创制与专用品种筛选等方面技术研发与集成配套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高效农机、先进智能装备和管理系统推广应用遇阻。

保障农民种好地

立足现代农业发展新时期,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以赴破解种地难题,让农民有奔头、让种地有赚头。

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需要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确保农业后继有人。比如,青岛市即墨区段泊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培育了16支服务团队,有力支持了本地规模经营户的生产。便捷可及的农资农机服务、农产品供求和质量安全检测等信息服务